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6年第6期
总第(376)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16年3月31日

目 录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五年进展与高等教育未来方向的基本判断	
——《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报告》前言.....	邬大光 李国强 (02)
“十三五”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思路.....	别敦荣 易梦春 李家新 (10)
等级改变: 2013—2014年美国网络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	熊华军 诸旭 (17)
“2016: 我的一点希望”专家笔谈会实录.....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编辑部 (21)

编者的话: 2015 年是国家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 同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这是我国高等教育承上启下的关键年, 在这一年,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发布;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五年实施成效接受评估;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 彰显大学办学特色的大学章程核准公布, 高校办学进入“宪章时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前进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需要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努力, 坚守理想, 脚踏实地。为此, 本刊集中选编代表 2015 年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若干文章, 以飨读者。

主 编: 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 范笑仙 责任编辑: 聂文静 李 璐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教仪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 编: 100082 电 话: (010) 59893297
电子信箱: gaoyanbianjibu@163.com
网 址: www.hie.edu.cn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观点栏目)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五年进展与高等教育未来方向的基本判断

——《高等教育第三方评估报告》前言

邬大光 李国强

中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怎么评价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中国高等教育向何处去？这是任何一个关心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人，都会不断追问、反复思索的问题。乐观者说，这是高等教育最好的时代，这是成绩显著的时代，这是奔向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时代；悲观者说，这是问题多多的时代，这是大学之道丧失、功利主义盛行、高等教育浮躁的时代；激进者说，中国高等教育病症不轻，必须动大手术；平和者说，一切都是正常现象，发展中的问题需要时间去慢慢化解。社会上关于高等教育的各种评说如此种种，纷纷扰扰，让不明就里者如坠云里雾里。而中国高等教育不论“你见或者不见，它就在那里”，面对各种好与不好的评说，默默前行。

应该说，不论乐观者的颂扬、悲观者的失望，还是激进者的抨击、平和者的耐心，凡抱着诚意理性说出自己真实看法的人，都是在表达对高等教育的关心甚至殷切期望。现代高等教育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与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每一个人也都有权利表达对高等教育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期望和要求。现实中，中国高等教育也绝不会因沸沸扬扬的评说而踟躇不前。目前真正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表面喧嚣的各种说法中静下心来，理性探讨，认真反思，想想我们正在哪里、要去哪里、应该做些什么。

在此背景下，教育主管部门推出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教育规划纲要》）颁布5年来的实施进展进行“第三方评估”，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作为“体制内”的研究人员，我们显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第三方，但作为第一线的高等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尤其是作为当年《教育规划纲要》制定时的直接参与者，更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在5年后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进展进行评

估，并尽可能站在“第三方”的立场，做出客观判断。

一、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

其实，目前在我国出现的种种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和水平议论纷争的情况，并非我国独有。在西方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也曾多次出现类似的现象。如英国的纽曼在1850年代以大学自由人文教育理想对抗斯宾塞等人的科学实用主义教育观；1960年代的英国人为要不要举办“开放大学”以及如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而发生的争论；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中言及的1960、19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的“艰难时期”和让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等等，都反映了西方国家高等教育进程中的同样经历。

在西方学者那里，这种现象被称为高等教育的“本体危机”（霍奇金森和布洛伊，1971）或“合法性危机”（霍夫曼，1970），此种现象折射的是“社会和职业界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各国历史上那些关于高等教育“本体危机”的著名论争，都发生社会转型与高等教育转型“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每一次危机和论争过后，各国高等教育也都向着更加“现代化”的方向演进了一步。如英国工业革命后的社会转型时期，崇尚科学实用主义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兴起，引发了“纽曼们”的担忧，但纽曼在1850年代发表的“大学理想”演讲，却无力阻挡新型高等教育机构的蓬勃兴起，也无力阻挡应用科学研究成为英国新大学的职能。1950、196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中的种族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等叠加在一起，同样以一系列震动的形式“粉碎了学术界的一贯自鸣得意”（布鲁贝克，1978），引发了197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高等教育“可靠性”的反思和“合法性危机”的大讨论，

进而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性质和制度结构上的某些变化，如在很多州，黑人首次有权进入大学学习，直接促进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

如果人们认同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这样规律的话，那么，目前我国社会中对高等教育各种好与不好的评说，也就可以理解（或至少可以部分理解）了。因为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社会转型和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相互叠加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也是一个给高等教育带来众多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大致来说，社会转型是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正在发生的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产业结构调整、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人的生存生活方式改变、社会道德风尚重构等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化；高等教育转型是指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以后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走向现代教育，以及由此带来的管理体制变革、办学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招生就业体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变化。而种种变化叠加导致的高等教育“身心”的不适应、打开国门之后看到新奇的高等教育现象带来的心理冲击（注意：新奇、新鲜的事物不一定是好的事物，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事物）、对所谓西方“先进理念”或“先进经验”的饥不择食与未能理解透彻的“囫圇吞枣式学习”、意识先进者和意识落后者的观念冲突、急欲发展和急于“超越”但自身现实基础条件不足的紧迫感等等，则构成了各式高等教育评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深层社会心理基础。

然而，要判断当下我国高等教育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仅有上述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答案。这是因为，尽管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在转型发展时期都会存在“本体危机”和发展方向的争论，尽管转型时期的“实践混乱”和观点论争是可以被人们所理解，但仅用“转型”来做笼统解释，还是无法完全解决人们心中对中国高等教育“要去哪里、该做什么”等种种问题的疑惑。

进一步说，尽管世界高等教育存在某些相似性和一般性的发展规律，但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动因、路径、影响因素、过程和结果是各不相同的；高等教育的每一次转型发展，都是在本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本民族教育文化传统与未来选择的矛盾力量“拉扯”中，为解决本国具体现实问题和特殊实践

问题而发生的转型，即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其转型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困境。我国高等教育也不例外。

所以，要想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做出更加具体和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必须解答当前社会历史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殊性特征以及转型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主要矛盾是什么。而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可比经验，认清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时期的必然要求，也是探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道路、形成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自觉和道路自信的必然前提。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与上述言及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相比，更具有“中国的印记”和时代的烙印，这是对《教育规划纲要》颁布5年来进行评估的大前提。

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审视《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的进展，是我们进行评判的起点，脱离了这一视角，就很可能走上西方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今不如昔”的论争。关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问题的解读，可以从宏观到微观的多个层面、多种角度、多个主题展开。本文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暂且只能从我们个人有限的经验出发，提出两点宏观层面的基本判断，供读者参阅思考。我们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可以归结为：

第一，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来标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绝不是为了表达的简便，而是放在中国真实的社会背景下，才能更加清晰地厘清中国高等教育所处的环境，尤其是面临的压力。看似平常的话语背后，至少隐含着4个层面的重要问题：①表层实践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多做什么、应该少做什么？②中层理论问题，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应该多做哪些该做的事情，少做哪些不该做的事情？③深层理论问题，在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后期，保证高等教育实践“稳定性”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处在一个“改革”的呼吁和浪潮之中，却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你能希冀一个经常变动的高等教育体系给社会经济提供有效的智力和人才支撑吗？④回归实践主

体自身，这一时代的教育核心价值理念是从哪里来的？符合时代的教育理念究竟是怎么形成的？高等教育实践主体基于什么样的人生经验或社会历史经验而选择了这些价值理念？

如果以“工业化+现代化”的复合词组作为定语，来观察分析并划分西方社会与高等教育相伴发展的历史过程，可将相应的历史时期划分为18世纪启蒙运动到1960年代这大约200年的区间；启蒙运动前的西方高等教育时代主要是教会把控下的经典大学时代；1960年代以后的西方高等教育则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时代，借用西方学者的用语，可将其称为“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或者“后工业、后现代”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从历史上看，在上述每个历史阶段，西方各国的高等教育需求都是多样的，高等教育形式结构、科类结构等也是多元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只分析每一历史阶段的高等教育主流是什么，也就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或社会选择与淘汰的过程，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将被那一时期的历史铭记，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是那一时期促进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启蒙运动到1960年代之间，在欧美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表现为：①为教会和贵族服务的古典自由教育相对式微，适应近代工业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学院、专业教育的规模数量不断增多。在英国，1850年代是牛津大学历史上最为衰微的时代，而几所苏格兰的“新大学”由于注重实用科学教育，成为当时最受瞩目的英国著名大学，当时苏格兰的“新大学”模式也被移植到了澳大利亚等英属殖民地。在启蒙运动到1960年代将近200年的时间里，以纽曼为代表的自由教育的“捍卫者”，提出的“绅士教育”理念，最终还是成了工业时代实用科学教育“洪流”兴起的陪衬。但也不容否认，纽曼等人的“呼吁”也确实起到了“警告”科学实用教育不要过于“猖狂”，“警告”专业教育不要走向过于片面的作用。即使时至今日，依然会有人经常怀念“纽曼时代”的大学理念。②政府权力对教会权力的取代以及对高等教育影响的加强，这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和德国形成了国家主义的高等教育模式，即使如很多人认为联邦政府不会干涉高等教育发展的美国，也通过1862年、1890年两个《莫雷尔法案》，来鼓励发展农工专业教育；③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程度日益紧密，传统大学不得不纷纷

“走出象牙塔”，等等。上述发展特点之所以被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历史铭记，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反映了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主流。也可以说，这一时代的西方高等教育与经典大学时代相比，已经截然不同。

那么现在，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中后期，如果我们要学习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经验，是应该更注重观察和借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高等教育经验以及从现代进入“后现代”的转型时期经验？还是要大力倡导回到西方经典大学时代，或者不加选择地照搬近几十年西方“工业化、现代化”成熟时代的高等教育经验？答案不言自明。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中西比较非常笼统、非常机械，科学性并不充分（更加精细、更加科学的论证需另文阐述），并且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也是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等进程杂糅推进，比西方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更为复杂。通过上述对比，我们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当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经验时，要尽量把每一个西方高等教育现象的社会背景、前提条件、发生过程、后续效果等认识透彻，然后再根据自身条件来判断是否真正“为我所需”，是否能够真正“为我所用”以及用到什么程度。

在这方面，我国前些年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选择做的其实并不够精细。对待西方高等教育经验，很多研究是不做深入分析、不加选择地“拿来主义”学习方式，把从古到今的西方经验全部“吃进肚里”，不仅“消化”起来难受，而且还导致目前社会上对高等教育的各种评论中，出现了很多极不“专业”甚至毫无道理的说法，乃至苛求。

由于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历史较短、发展经验积累不足，在不得不更多依赖观察和借鉴他国经验而求索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教育工作者只有更加努力地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只有具备了明辨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特殊规律、偶然现象与必然现象的能力，才能在借鉴他国经验的过程中，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进而也才能尽快摆脱议论纷争困扰，集中精力办好该办的事，走好该走的路，不断开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时代、新境界。

第二，当高等教育在规模和数量上进入了大众

化发展阶段之时，其实系统、科学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理念尚未完全形成，支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和制度都存在明显的供给不足，这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按照马丁·特罗在1962年提出的观点，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观念、评价模式等方面都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但当特罗的大众化理论引进我国伊始，人们只关注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量与规模”的描述，而忽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质的规定性”。在我们看来，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阶段理论”的真正价值和历史意义所在，正是他提到的高等教育数量规模之外的那些变化（但近年来我国很多人只是把眼光盯在那些不断跳跃攀升的数字上），他的观点对于“后发”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来说，具有极强的“预警理论”功能。更明确地说，当高等教育规模数量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如果后续的那些变化不能及时跟上，将会引发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我们看来，有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化解，最后可能会以某种“破坏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是有过深刻历史教训的，如1968年法国爆发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法国旧的教育体制。

过去若干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推进大众化的进程中，把着眼点和主要精力集中到“体制”问题上，包括管理体制、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在基本的体制改革完成之后，又推出了与体制相关的“大学章程”和“综合改革方案”。其实，上述“切入点”依旧没有摆脱从体制改革切入的思维方式。我国高等教育走到现在，体制上的障碍并没有彻底解决，但任何体制上的改革，如果没有转化到高等教育质量这一根本命题上来，或者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与质量提升实现有机的结合，体制改革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应该承认，在强调体制改革重要性的大背景下，体制问题遮蔽了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涉及最微观的若干质量问题，如教学投入、教育教学方式、学生学习体验、课堂教学等，都缺乏应有的重视。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讨论在我国开始热门，很多人误认为我国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是规模数量增长与教育质量下降的矛盾。然而，高等教育质量下降到底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

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理解，不能简单地凭感觉判断，如果人们只是从表面现象对这个“似是而非”的“质量下降”问题进行讨论，只能说明人们忽视了高等教育质量的真正含义，甚至会导致用“质量下降”问题遮盖高等教育转型发展必须面对的真正核心的矛盾问题。

在我们看来，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非常丰富，既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质量、各项教育工作协调运转的质量，也包括高等教育各项体制与制度的性质和“质地”，还包括高等教育与本国社会发展、国民生活幸福之间的契合程度等复杂含义。目前我国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问题，恰恰在上述内涵的后两个方面，才是我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的关键所在。

大众化高等教育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是一种很不一样的高等教育。精英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建立在少数精英人才基础上的价值判断，讲究人的能力素质、身份地位的分层、分级，提倡“奖优罚劣”等等。高等教育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对应的制衡力量，精英高等教育实践最终一定会走向为精英阶层利益服务。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平等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观，提倡不分身份、地位、等级的教育平等权利，提倡主体的自主、自立、自强，提倡教育为社会、为大众服务。马丁·特罗提出“大众化高等教育”观点的文章名为《美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其含义即在于此。

我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宗旨即为人民大众的平等、民主权利和生活幸福服务。所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我国从不缺乏。建国以后到21世纪初的精英高等教育阶段，是因为国家经济基础薄弱、高等教育资源缺乏而导致必然要经过的高等教育发展的“精英阶段，但以前的计划体制和精英主义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也导致产生了一些带有精英主义性质的高等教育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教育资源日益丰富，为社会大众服务的高等教育也具有了实现的基础。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也必然意味着要对精英高等教育时代的部分理念和制度，尤其是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体制进行重新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自2002年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以来，正处于这个复杂变化、多重任

务、多方面转型的改革发展时期，需要调整的方面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这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异常繁重的主要原因。而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的整体缺失以及新的质量观念尚未完全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尚不健全，也导致目前出现了一些实践混乱、非议增多的现象，尤其是某些不合时宜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把高等教育推到了风口浪尖。

值得注意和欣慰的是，2010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三年，随着《教育规划纲要》深入实施，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的供给速度正在加快，全社会对大众化高等教育质量观念有了切身感受和需求，尤其是走“内涵发展”的理念逐步形成，使得我们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方向充满了期待。我们也相信，在未来5—10年内，随着新旧制度体系转换完成，完善的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一定会建立起来；如果社会经济发展也度过目前的转型期，国家综合实力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这一历史时期一定会顺利度过。

二、如何评价目前的中国高等教育现状

全面、完整地评价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质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或者是在高等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在评价其自身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时，也会出现多种的声音。以美国为例，自二战之后，高等教育的“危机论”始终不绝于耳。再如，在上个世纪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上，会员国最后签署的《世界高等教育宣言》就明确提出世界高等教育的“三大危机”，即：财政危机、质量危机、道德危机，“三大危机”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给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预警作用”。对于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对《教育规划纲要》进行5年实施效果的评估，究竟是采取西方的评价视角，还是依据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性和特殊性”的视角，是我们课题组在动手之前一直思考的方法论，最终，我们没有采取西方惯用的“危机理论”。我们之所以采取相对正面的视角，是基于如下考虑：

其一，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时期的议论多、评价各异，是好现象，至少说明很多人是关心高等教育的，也说明高等教育批评的言论渠道是通畅的；转型时期的某些争议可能会随着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的变化而逐渐消失。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尤其是在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相对集中的条件下，即使是一项正确的改革措施，也会由于原来的基础和条件不同，在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走样或异化”的现象。因为从国家层面制定《教育规划纲要》，更多考虑的是全国一盘棋，对哪些是主要问题哪些是次要问题还缺乏清晰的判断。因此，面对各种争议，尤其是一些重要议题争论，可以暂时搁置，等待实践发展去检验。

其二，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问题。即使目前对我国高等教育某些方面提出尖锐批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综合国力提升和社会发展进步，我国高等教育在原来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15年，高等教育规模跨越式增长，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日益扩大，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质量总体水平逐步提升，高等教育作为国家创新发展驱动的作用和能力日益增强，高等教育管理和决策不断走向民主化、科学化，现代高等教育制度体系正在完善，逐步开创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另外，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相比于西方高等教育近一二百年的现代化转型发展过程，用30多年时间打造一套成熟完善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在时间上显得不太足够，尤其是社会转型给高等教育带来的挑战和压力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待更是超过了我国现有的实力和承受能力；许多《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和措施正在路上，相当一部分想法和举措还都在探索中，距离完善的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模式还有较大的差距，还有很多工作尚未完成；在规模扩大、结构多元、运行复杂的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和提高水平，会面临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包括以往改革进程中尚未完全解决的老问题，也包括新的发展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所以，总体上，我国高等教育仍处在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由传统教育转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发展关键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其三，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具体细节方面的评价，从人们关心的问题和评价内容来说，这里已经无需多言。我们仅以高等教育评价方式为例，从一个很小的方面来看近几年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改进。从高等教育评价方式来说，科学合理的“最优选择”，必然是专业评估以及社会各界公共

评判的有机结合。之前十多年，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的方式一直由教育管理部门负责，采用专家咨询、专家建议的办法，近几年来，在“管办评分离”改革进程中，教育部首次采用委托社会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中期的教育改革进展情况进行全方位评估，并向全社会公开评价结果，这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管理制度不断走向科学化、透明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其历史价值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充分体现。

2010年制定的《教育规划纲要》，是在我国社会和教育发展新形势下出台的一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政策文件。《教育规划纲要》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是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以“努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构建和完善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核心，提出的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可以认为，《教育规划纲要》进一步明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新时代的改革发展方向，其中对高等教育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核心问题的判断十分准确，提出的各项改革发展任务也非常具有针对性。5年来，针对《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任务，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各类高校积极进取，做了大量工作，取得的实效正被人们体会和“分享”。

在《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之际，按照《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跟踪检查”的要求，教育部统一部署了对教育各领域改革进展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的工作。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受教育部委托，承担了高等教育领域第三方评估的课题任务。

从接受评估任务伊始，我们就深知肩上责任重大。因为：其一，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多重转型、复杂变化的发展状态下，厘清纷乱繁杂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表象，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进程做出科学、客观、合理的评价，并给全国人民一个清晰和令人满意的交待，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而且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其二，教育改革发展评价从来不是回顾过去、陈述事实、总结成绩与经验、诊断发现问题那样简单，在教育评价的每个范畴、每个对象、每个环节背后，都蕴含着价值判断和未来方向引导的深刻用意。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现状来说，更像在波涛汹涌、迷雾和暗礁重重的大海上为一艘正在破浪前行的巨轮检修部件、诊断船体健康程度、确定航向方位、校

准行进路线，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导致不可预计的损失。所以，只有以高度的责任心、科学求实的态度来做好每一项目的评估，才能不负社会各界以及相关部门的信任。其三，在讲究和依靠大数据的时代，仅仅依靠所谓理论家的“感觉”和价值判断已经无法完成第三方评估的目标。因为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数据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尤其是微观的数据越缺乏，其可靠性也随之降低。故课题组只能依据有限的“政府文本”和无限的学校案例进行“大海捞针”式的取样进行研究和评判。

接受第三方评估任务以后，课题组成员经多次开会研讨，大家一致认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评估研究任务，一是要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工作安排，对教育部高教司负责的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任务的实施情况、实施成效进行评价，并根据发现的问题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二是结合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可比经验以及我国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情况，在尊重客观现实和遵循历史逻辑基础上，对近5年来高等教育每一项改革举措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等进行“元政策研究”意义上的再检视和再评价，进而归纳、凝练、明晰、校准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路径和方向，回答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道路问题。

之所以必须做这后面一步的研究工作，一是因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条件日新月异，有必要随时检视反思、重新校准各项实践的行动路径和方向；二是因为我国以往的高等教育改革举措以及为其提供科学支撑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有大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现状为参照物的，经常忽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性与特殊性的深入研究，忽视对某一项实践举措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的科学分析，这对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会有消极影响，不利于形成我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的道路自信。而现在的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现实和基础条件，已经到了对以往的理论 and 实践进行再反思、再审视的时候。这是进一步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决策与实践的科学性、促进高等教育顺利渡过转型发展期的客观要求。

在上述认识基础上，从2015年5—9月，课题组从高教司负责实施的各项高等教育改革任务中，抽取近30个观测点，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查研究和分项评估；9月到10月，通过集中研讨，形成了总体

的评估结论。课题组成员一致认为，近5年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以“大格局”谋划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调整，以“大工程”牵引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以“大协同”创新高校内外联合培养人才，以“大实践平台”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以“大教改”激活高校学生创新活力，以“大联动”构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整体质量水平明显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为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认为，上述总体结论，是对过去5年若干做法基本描述，并不代表上述做法已十分完善，我们更愿意说它是《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发展思路雏形”。另外，针对评估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如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高校办学与社会需求脱节、高校活力尚未完全释放、高校教学中心地位仍欠重视、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机制尚未健全等，提出了下一步改进工作的相应建议。

三、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

通过对近些年每一项高等教育改革举措进行重新检视，课题组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未来方向和具体路径进行了系统梳理，进一步得到如下认识：

第一，加强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仍是当前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主题。但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念和质量思维亟需扭转。需要深入理解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尽快形成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内涵，我们在前文已经有过解释。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观，不仅是一种多元质量观，还是一种平等质量观，更是一种“以生为本、以社会大众为本”的质量观。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发展形态和实践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学校层次类型多样，每一所高校的职能任务更加多元，高校办学更加贴近大众生活和大众需求，所以不能再以精英时代的高等教育质量观念和单一质量标准，去判断和要求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质量。否则就会“南辕北辙”，失去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本来意义。

进一步说，在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所谓高等教育质量的“优质”、一流大学的“一流”以及高等教育强国之“强”，绝不是和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和大学相比较而得到的评价，而是高等教育在满

足本国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需求过程中得到的本国社会和国民的评价。扎根本国本地现实，着眼于为本国本地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最大努力程度的服务，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优质、大学走向一流的必由之路。中国高等教育和大学发展应该具备这样的道路自信。

第二，高等教育质量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一套全新的、适应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也是一个大的概念和工作框架，囊括了目前几乎所有的高等教育改革工作任务。其中，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不仅是指师资、场地、设备等达到办学条件基本要求，更是指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及课程标准设计、教学科研管理、评价制度要进入一种刚性与柔性并重、系统开放透明、标准多元、实践适切、动态评价、大数据管理的全新发展状态。而高校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既是在公共管理理念基础上，通过“管办评分离”、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大学章程制定、教学评估、专业评估机构与制度建设、年度质量报告制度等来构建新型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更需要树立“标准化”思维，用适应本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国家学历资格与人才标准框架体系”“高校专业质量标准和课程标准”等标准体系，来为高等教育发展和高校办学提供方向指引和底线标准的界定，甚至还要更“外围”的社会用人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来作为辅助。

从现实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早已行进在这样的道路上，2003年开展的高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2007年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甚至包括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其实都是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近5年来，随着《教育规划纲要》各项工作的实施和推进，我国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的“拼图板块”也正在一块块形成，新的高校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已经初见雏形。只不过，在近些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一是各项新的改革举措还没有形成一套整体联动的机制，二是旧的制度体系中那些已经不适应形势的旧制度、旧措施还没及时清理。由此，未来几年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完善设计，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协调统一与联动机制。

第三，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宏观

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迫在眉睫。我国1990年代进行的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改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当时是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背景和精英高等教育理念下进行的改革。那时，我们并未接触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实践现实，也并不接受或者完全理解大众化高等教育的真正含义。特别是1990年代末期，由于全力应付扩招和高校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本应当时启动的各项改革陷于停滞，遗留下很多尚未深入思考和妥善处理的问题，如行业办学取消以后高等教育与社会行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疏离？高校与社会行业需求之间的关系后续如何处理？绝大部分高校归地方教育部门管理以后，中央和地方教育部门沟通以及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与地方高校之间的关系是否要调整设计？地方教育管理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地方高校根据地方现实需求开展办学活动？等等。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数量规模上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已有十几年，并且很快就会进入到普及化阶段。但由于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让人感到“别扭”的问题，让我们进一步体会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绝不仅仅是一个规模数量变化的问题，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现实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体制和机体系转换的问题，因为这直接涉及资源配置方式。所以，在当前有必要重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深化改革的话题，通盘考虑大众化高等教育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系统运转问题。中国若要实现高等教育强国的使命，并不仅仅是几所或者十几所高校进入世界200强的问题，而是各级各类高等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形成大众化时代的高等教育责权利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政府间、高校、高校间、市场、社会行业间的关系，特别是市场和民间要有发出声音的渠道，要逐步扩大民间的“话语权”，最终形成以“参与和分享”为特征的高等教育公共治理体系。近几年进行的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已经开始为将来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搭建了新的制度构架。就政府宏观管理来说，除了走向公共治理，还

要改变以前经验管理、粗放管理的传统手段，逐渐走向“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的大数据管理。此外，在政府传统管理权限下放的过程中，要根据“承接者”的自主能力、社会责任能力等，掌握好节奏，积极稳妥推进。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就是基于我国还是“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提倡多元办学、多主体办学，就是在未来5—10年内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普通高校与职业高校在身份、地位等方面的差别。凡有利于教育公共福利提升的办学行为，都要通过新的制度体系予以保护。

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我国高等教育自1990年代中后期形成“财、税、费、产、社、基、科、贷、息”的多种融资渠道以后，各类资金为我国各级教育规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近十几年来，除高校生均拨款标准和高校学费方面的几项政策以外，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体制改革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随着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时代的过去，地方高校财政投入将会面临较大压力，而某些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间融资渠道迟迟难以扩大流量，比如社会捐赠、社会基金等。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融投资总量能否保持稳定甚至稳中有升，是高等教育能否长期稳定发展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从长远考虑，高等教育向民间融资的渠道有待进一步拓宽。而民资进入高等教育，一定会涉及到教育产权制度的问题，因为只有明晰的产权制度体系和明确的权益责任义务关系，才能让民间资本明明白白投入，放心大胆地支持教育长期稳定发展。由此，探索和建立现代教育产权制度，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邬大光，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李国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厦门大学高等教育质量协同创新中心助理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1期）

“十三五”时期研究生教育发展思路

别敦荣 易梦春 李家新

“十二五”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势头良好，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表现在：第一，研究生教育规模稳步扩大。2014年，我国研究生招生数为62.1323万人，较2010年增长15.4%；研究生在校生数为184.7689万人，较2010年增长20.1%。其中，博士生31.2676万人，较2010年增长了20.75%，硕士生153.5013万人，较2010年增长了19.97%。第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总体结构趋于合理。2014年，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生数达61.2854万人，较2010年增长了176.48%；而学术学位研究生在校生数则为123.4835万人，较2010年减少了6.22%。第三，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和水平显著提高，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需求

“十三五”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需求主要来自国内，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所带来的对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巨大需求，二是高等教育自身加快发展、提高办学水平所提出的需求，三是在职人员对研究生学历学位教育的需求。同时，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国际需求还会进一步扩大，这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我国的国际化和全球化战略，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际战略的推行对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要求，二是高等学校推行国际化战略的要求，三是海外学生接受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意愿。这里主要对国内需求进行具体分析。

（一）科技创新、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需求

创新驱动发展是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战略。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的部署与要求，国家正重点谋划一批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

的战略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等；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力争达到15%左右，吸纳、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高。这些战略新兴产业通常以重大技术突破为发展基础，具有知识技术密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体现了科技创新与产业技术的深度融合，需要大批高层次智力支持。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层次人才需求的满足上，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分析2009—2013年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的情况可以发现，R&D人员总数的年均增长率均保持在5%以上，见图1；博硕士R&D人员的比例在逐年上升，尽管如此，目前研究生R&D人员的比例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低的，2013年仅占总体R&D人员的46.08%，见图2。



图1 2009—2013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发展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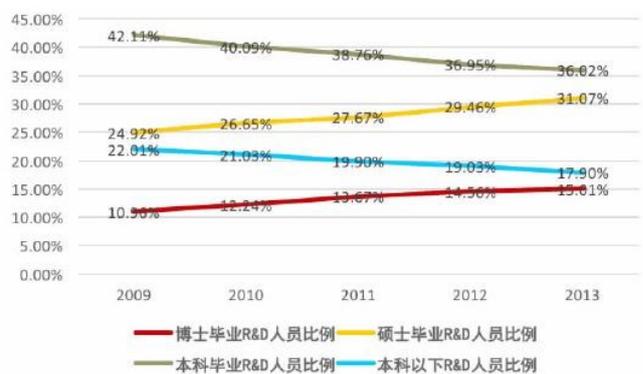


图2 2009—2013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变化情况

为配合国家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应当适度扩大理工科，尤其是相关工科研究生教育规模，调整研究生教育结构布局，并通过创新学科运行机制、推进跨学科人才培养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培养国家科技创新、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所亟需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二）社会基础领域、基本需要驱动的发展需求

理论上讲，研究生教育应当满足社会各行业、各领域的高层次人才需求。除国家重点谋划的科技创新与新兴产业领域外，我国众多传统行业、基础领域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依然旺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应“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薄弱环节是农业现代化”。研究生教育高层次专门人才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瓶颈之一。以农业现代化建设为例，有资料显示，美国于20世纪上半叶就开始积极通过研究生教育服务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随着高层次农业人才存量的不断增加，逐步实现了农业科研、教育与技术推广三位一体，实现了农业生产力的快速提高。目前，美国州一级农业推广员一般具有博士学位，兼农业教育、科研与技术推广职能于一身；县一级农业推广员一般也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在向农民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同时，也将农民的实际问题带回农业实验中心。而在我国，农业就业人员中受研究生教育的人员比例非常少。从2013年我国农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可以看出，受过研究生教育的就业人员仅占0.01%，见图3。在社会各行业的就业人员中，农业就业人员受研究生教育的比例排倒数第二，见图4。由于农业高层次人才总量严重不足，农业科研、教育与技术推广明显脱节，农业技术推广员通常只能由学士及以下人员担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农业服务体系和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与质量。

除农业外，医疗、教育等社会基础领域、传统行业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同样旺盛，除在少数大城市及东部沿海地区外，在医院、学校中，专业技术岗位普遍缺乏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高层次人才。2013年，我国医院卫生技术人员中只有6%的人员拥有研究生学历，执业医师中只有16.5%拥有研

究生学历，如表1所示。2014年，我国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分别只有6.36%和6.24%。而初中、小学、特殊教育、幼儿园的专任教师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比例更低，如表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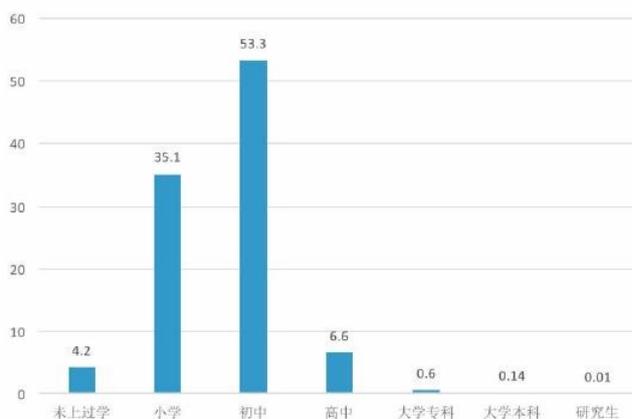


图3 2013年我国农（狭义）、林、牧、渔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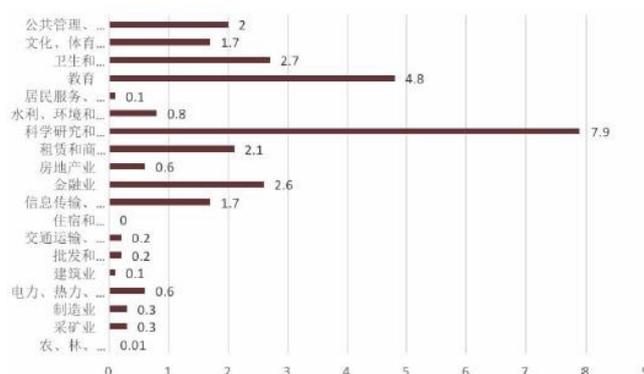


图4 2013年我国各行业就业人员中受研究生教育人员的比例（%）

表1 2013年我国医院卫生技术人员学历构成（%）

学历分类	总体	执业(助理)医师	执业医师	注册护士	药师(士)	技师(士)	其他
研究生	6	15.1	16.5	0.1	2.8	2.7	4.5
大学本科	29.8	50.9	55.1	14.6	24.6	27.6	28.8
大专	38.6	24	20.2	49.9	36.1	41.5	37.4
中专	24	9.3	7.5	34.2	29.3	25.1	25.9
高中及以下	1.7	0.8	0.7	1.2	7.3	3	3.5

表2 2014年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学历构成（%）

各级各类学校	合计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高中及以下
普通高中	100.00	6.36	90.89	2.70	0.06
中等职业学校(机构)	100.00	6.24	83.06	10.24	0.47
初中	100.00	1.57	76.32	21.64	0.47
小学	100.00	0.48	41.20	48.16	10.16
特殊教育学校	100.00	1.76	57.83	36.31	4.10
幼儿园	100.00	0.25	18.14	53.70	27.90

从这个角度来看，为提高社会基础领域、传统行业的从业人员队伍素质、科技含量与现代化水平，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必须进一步扩大相关学科专业领域研究生教育规模。

（三）中西部地区发展、教育区域平衡发展的需求

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存在严重的区域不平衡现象。分析2014年我国各地高校的研究生学位授予数和在校生数可以发现：我国62.21%的研究生学位是由东部地区的高校授予的，17.35%的研究生学位由中部地区高校授予，20.44%的研究生学位由西部地区高校授予；东部地区高校的研究生在校生数占全国研究生总在校生数的62.23%，而中部、西部地区高校的研究生在校生数分别占全国研究生总在校生数的17.23%、20.53%。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占有绝对优势，中西部地区明显落后，如图5、图6所示。“十二五”时期，国家启动“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重点支持建设中西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所地方高校的发展建设，使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得以加速发展，高校办学实力有所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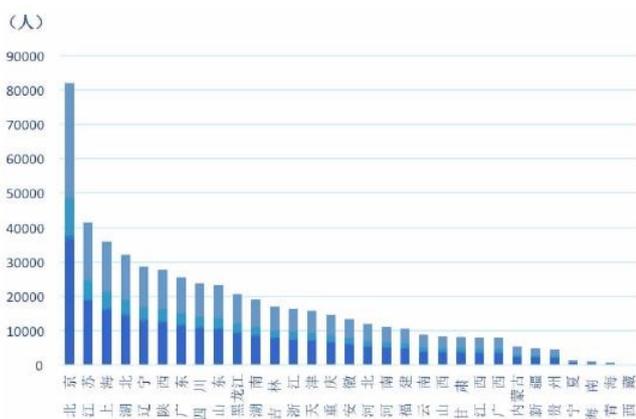


图5 我国各地区高等学校（机构）授予研究生学位数分布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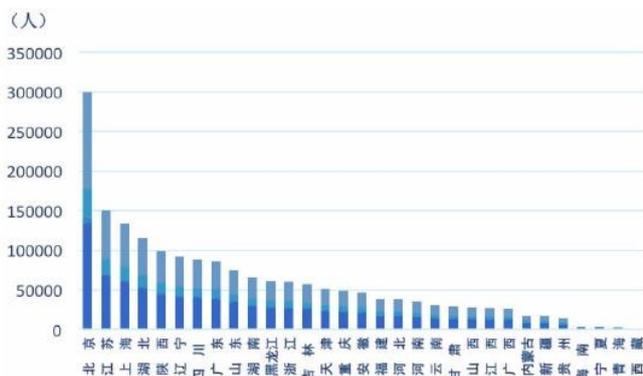


图6 我国各地区高等学校（机构）在校生数分布情况

现实地看，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还是要依靠中西部地区高校培养，因此，中西部地区高校加快发展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十分强烈。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对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要求是现实的、迫切的。从促进研究生教育发展区域平衡，满足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角度讲，中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还应扩大发展。

（四）高等教育、高等院校自身发展的需求

我国研究生教育主要集中于以“985工程”

“211工程”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和省属重点院校，多数地方院校、职业院校、民办院校不具有研究生教育资格。近10多年来，尽管研究生教育规模得以显著增长，但从增量的实际情况看，增加的部分（无论是学术学位还是专业学位）仍然主要集中于“985工程”“211工程”大学。2014年，我国2529所普通高等学校中仅有571所具有研究生培养资格，仅占总数的22.58%。2014年，我国中央部属高校113所，107所具有研究生培养资格；地方高校1689所，其中只有464所具有研究生培养资格。2014年，具有研究生培养资格的464所地方高校在校研究生数为861468人，校均仅为1857人；具有研究生培养资格的7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在校研究生数为789183人，校均10811人，是地方高校研究生校均人数的5.8倍。部分地方院校、职业院校、民办院校在“服务国家特殊需求计划”中获得了试办专业学位教育的资格，极大地调动和促进了这类院校开展学科专业建设的积极性。“十二五”时期，国家实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战略，地方院校、民办院校、职业院校的发展受到重视，部分院校具备了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条件和能力，对发展研究生教育有十分强烈的愿望。

高等教育领域是毕业研究生就业的主要部门之一。我国高等院校教职工的学历学位一般都要求研究生毕业，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这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硬需求之一。据统计，2014年我国普通高等院校教职工总人数达到233.57万人，专任教师153.45万人，在专任教师中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占56.43%。满足高等教育部门人力增加和更替的需求，依然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五）产业创新驱动的继续教育发展需求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化以来，高等教育规模增长迅速，为社会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才，社会从业人员的学历结构有了显著改善，2013年全国就业人员中，受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的占14.5%，较10年前翻了一番，约是1997年的五倍，如表3所示。社会各行业从业人员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继续教育愿望也会日益强烈，攻读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但受条件和政策所限，我国研究生教育仍主要以满足本科毕业生为主，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部分一直较为薄弱，在职研究生教育规模较小。2013年底全国总就业人数为76977万人，其中大学本科及专科毕业人员约10776.78万人。2014年我国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的在校生数为59.6086万人，招生数为16.2374万人，招生数仅占2013年就业人口中大学本科及专科毕业人员的0.15%。显然，这种状况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需要。发展非传统的研究生教育，满足在职人员更新知识技术和提高学历学位的要求，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表3 我国就业人员中受大学专科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变化情况

受教育程度	2013年	2004年	1997年
大学专科	8.50%	5.00%	...
大学本科	5.50%	2.10%	...
研究生	0.50%	0.10%	...
总计(大专及以上)	14.50%	7.20%	3.50%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总体思路与规模预测

“十三五”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不仅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需求，而且还应当通过适度扩大规模，调整结构，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大批高技术战略产业所需要的高层次专业人才，造就新经济、新产业发展的领军人才，引领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因此，“十三五”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应当有新思路、新战略。

（一）基本思路

“十三五”时期，在“满足需求、提高质量”的总体要求下，我国研究生教育须坚持“积极稳健发展”的基本思路，有计划地进一步扩大总体规模，以满足社会各界与高等教育系统对高层次专业人才的旺盛需求，保持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良好势

头；进一步优化和调整结构，处理好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坚持存量调结构，增量促发展的原则，维持一定程度的研究生教育供给的“饥渴度”；全面推动研究生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改革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和而不同的办学模式，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与效益，提高研究生教育国际竞争力，使我国进入研究生教育强国行列。

（二）总体保持现行规模增长幅度

“十三五”时期，贯彻“积极稳健发展”的要求，我国研究生教育总体规模应当保持稳步增长，涨幅不高于近10年年均增长率，不低于近5年年均增长率。

1. 研究生教育总规模。近10年（2005—2014年）我国研究生教育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7.36%，近5年（2010—2014年）年均增长率为5.66%，如图7所示。综合考虑国家战略、社会基本需要、培养单位承载能力等因素，“十三五”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增长率保持在近5年到近10年的平均值之间，即基本维持5.66%~7.36%的年增长率。按照这一增速区间测算，到202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在校生总规模为257.05万~282.88万人，中间值为269.97万人，如表4和表5所示。根据这一测算结果，与2014年相比，到2020年，我国研究生教育总规模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增长70万人左右；二是增长100万人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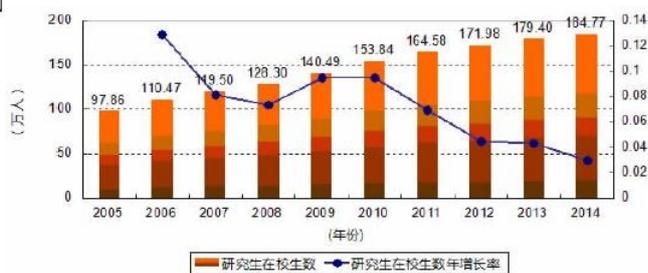


图7 2005—2014年我国研究生在校生数变化情况

表4 研究生总体在校生规模预测一（以7.36%为年增长率）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研究生在校生数(万人)	198.36	212.95	228.62	245.44	263.50	282.88

表5 研究生总体在校生规模预测二（以5.66%为年增长率）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研究生在校生数(万人)	195.22	206.26	217.93	230.26	243.29	257.05

2. 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近9年（2005—2013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

8.40%，近4年（2010—2013年）的年均增长率为6.62%，如图8所示。“十三五”时期，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年均增长率维持在6.62%~8.40%。按照这一增长率区间测算，到2020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校生总规模为234.29万~262.97万人，中间值为248.63万人，如表6和表7所示。根据这一测算结果，与2014年相比，到2020年，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保持在250万人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图8 2005—2013年我国硕博研究生在校生数变化情况

表6 研究生总体在校生规模预测一（以8.40%为年增长率）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数(万人)	162.12	175.73	190.49	206.48	223.81	242.60	262.97

表7 研究生总体在校生规模预测二（以6.62%为年增长率）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数(万人)	159.47	170.03	181.29	193.29	206.09	219.74	234.29

3. 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硕士生教育规模。自2009年开始，我国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十二五”时期基本上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增速较快，近5年（2009—2013年）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45.41%，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明显受到了严格控制，在校生规模呈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88%，如图9所示。这两个增长率都不是常态发展的结果，



图9 2009—2013年我国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校生数变化情况

不足以作为未来五年两类硕士研究生发展规模预测的依据。

“十三五”时期，根据研究生教育学位结构调整的要求，到2020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与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达到1.5:1~2:1之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增长速度将趋于平稳，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将继续保持下降的趋势，硕士研究生教育结构调整基本到位，建立起以专业学位硕士生教育为主的硕士研究生教育体系。

根据对硕士研究生教育总规模的预测，到2020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达到140.57万~175.31万人之间，中间值为157.94万人。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减少到78.10万~105.19万人之间，中间值为91.65万人。根据上述测算结果，到2020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保持在160万人左右，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保持在90万人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三）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保持积极稳健增长

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学术学位教育，专业学位教育类别不多、布点较少、规模还较小。长期以来，博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满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部门和企业高新技术研发的需要。前者主要是社会基本需要，也可以说是刚性需求，而后者主要是国家和产业发展急需。博士研究生教育计划供给的行政分配性与政策导向性非常明显。近年来，尽管社会、国家对博士研究生的需求增长很快，个人也有提高学位水平的要求，但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增长受实际需求的影响却相对较小。

1. “十三五”时期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需求仍然很高。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长期保持低增长，不仅总体规模小，每年的增量小，社会存量也较小。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事业突飞猛进，社会对博士毕业生的需求呈快速增长之势。与1999年相比，2014年高校专任教师数量由55.62万人增长到156.6万人。统计表明，2014年我国高校教师拥有博士学位的人数为31.39万，仅占专任教师总数的20.05%。2014年，我国博士研究生在校生规模31.27万，博士研究生年招生7.26万，毕业人数5.37万。就现有博士生招生和毕业规模而言，不要说满足国家急需和其他社会基本需

求，仅就满足高校专任教师对博士学位的要求这一项，就是短期内完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再加上我国相对匮乏的高层次人才存量，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明显不能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和来自其他方面的要求。总体来看，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发展需求仍然非常旺盛，且将持续一个较长时期。

“十三五”时期应保持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势头。

2. “十三五”时期博士研究生教育供给保持积极稳健增长。鉴于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刚性需求旺盛，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规模应保持增长态势。考虑到国家政策及培养单位办学能力、培养质量等因素，增长速度不宜过快，基本维持近几年的增速即可。

进入新世纪以来，创新驱动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加快，科技创新产业、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国家急需的博士生教育需求呈强劲增长之势。这里既包括了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也包括了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十二五”时期，部分高校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主要利用学术学位博士教育指标得到发展，所以，表现出发展乏力的问题。“十三五”时期，应适当增加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种类，增加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指标，以适应国家需求。

考虑到博士生教育发展要求和相关教育资源状况，“十三五”时期，博士生教育规模应总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据统计，2005—2013年，我国博士生教育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5.72%，2010—2013年年均增长率为4.90%，变化情况如图8所示。

“十三五”时期，我国博士生教育在校生规模增长应基本维持在年均4.90%~5.72%之间；按照这一增速区间测算，到2020年，我国博士生教育在校生总

表8 博士研究生在校生规模预测一（以5.72%为年增长率）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博士研究生在校生人数(万人)	31.53	33.34	35.24	37.26	39.39	41.64	44.02

表9 博士研究生在校生规模预测二（以4.90%为年增长率）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万人)	31.29	32.82	34.43	36.12	37.89	39.75	41.70

规模预计为41.7万~44.02万人，具体见表8和表9。

据统计，2005—2013年，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

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5.40%；2009—2013年，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4.61%，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在校生规模年均增长率为22.71%，变化情况见图10。由于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近年的增长率不足以作为预测依据。按学术学位博士生教育年均增长率预测，到2020年，我国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教育在校生规模约为39.91万~42.07万人。结合对博士生教育在校生总规模的预测，专业学位博士生教育在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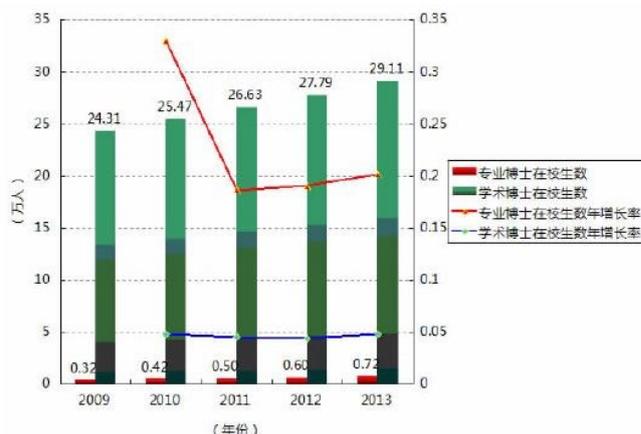


图10 2009—2013年我国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数变化情况

生规模约为1.79万~4.11万人。

三、“十三五”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举措

为了保证我国研究生教育积极稳健发展，应当建立健全政府、高校和社会共同治理体系，加强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建立政府宏观调控、高校自主办学、社会参与监督的体制机制，提高研究生教育发展水平。

1. 推进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三五”时期，应当以实现研究生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深化综合改革，加强政府对研究生教育的宏观治理，健全治理机制，明确政府主管部门、培养单位、学术专业机构以及社会之间的权责关系，完善研究生教育立法，将学科专业评议、招生指标控制等权力逐步下放，扩大研究生培养单位办学自主权。

2. 放宽在职人员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政策。在职人员接受研究生教育，既可以满足研究生教育的刚性需求，又可以极大的提高研究生教育满足国家

急需的能力。“十三五”时期，要进一步调整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结构，全面提高专业学位的比重，尤其是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比重。改革和调整相关政策，包括有关高校的研究生教育政策，解除对在职人员接受研究生教育的各种限制和不平等政策，为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开辟通道。

3. 创新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亟待完善，尤其对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而言，亟待建立更为完善、高效、富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生培养单位应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现代教育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改革课程和教学方式，加强与实际部门的合作教育，探索新的高效的教育教学方法，创新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4. 适度增加研究生培养单位数量。近10多年是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各高校加强办学条件建设、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提高办学能力和水平的时期，部分高校已经具有了开办硕士学位教育或博士学位教育的条件。应当改革学位授予单位审核办法和标准，根据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总体需要，扩大研究生培养单位数量，区别不同条件，在严格审核的基础上，赋予部分高校举办硕士学位教育或博士学位教育的资格和权限。

5. 进一步推进研究生教育国际化。国际化依然是我国高校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是增强我国研究生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要加强与国外高校在研究生教育上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加政府奖学金计划，鼓励学业优异的硕士和博士生赴国外高水平高校交流与合作培养，支持研究生导师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大力提倡和鼓励研究生和导师参与和开展国际

合作研究。鼓励高校探索与国外高校开展研究生教育学分互认和人员对等交流，支持高校与国外高校联合举办以研究生为主体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6. 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加强卓越研究人才培养。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研究生教育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主要内容。有关高校应当抓住机遇，利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条件，加强校企合作，深化合作教育，在一流人才培养上上下功夫，加强研究生教育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全面提高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7. 完善研究生教育内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完善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是研究生教育积极稳健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外部，应当建立政府问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研究生质量保障机制，政府问责重在投资效益与研究生培养质量，社会监督注重研究生教育的社会适应性。政府问责应发挥专业学会和教指委的作用，减少行政干预，提高政府问责的专业化水平。社会监督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用人单位等组织的作用。研究生教育培养单位应当不断完善质量保障机制，重点发挥院系和学位点的自我保障作用。

（别敦荣，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福建厦门 361005；易梦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李家新，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治学流动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博士后，上海 200438）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2期）

等级改变：2013—2014年美国网络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

熊华军 褚旭

美国已成为世界网络高等教育的先行者和领跑者，其网络高等教育发展备受世界关注。斯隆联盟报告（Sloan Consortium Report）一直被看作管窥美国网络高等教育发展特征的“窗口”。在斯隆基金会（The Alfred Sloan Foundation）和皮尔逊集团（Pearson Group）的赞助下，斯隆联盟（Sloan Consortium）、百森调查研究团队（Babson Survey Research Group）和大学委员会（The College Board）合作，于2014年1月和2015年2月分别公布了调研报告（简称“斯隆报告”）：《等级变化：美国网络高等教育跟踪调查》（Grade Change: Tracking Onlin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和《等级水平：美国网络高等教育跟踪调查》（Grade Level: Tracking Onlin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这两次调查涉及的样本高校都超过2800所，且根据2005年卡耐基高等教育机构的分类标准选取参与调查的高校类型。结合2014年和2015年的报告，以“等级改变”为关键词，展现美国网络高等教育当前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变革的走向。对这两份报告进行解读，能更深层次地了解美国网络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

一、将网络高等教育纳入其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高校比例上升

历年的斯隆报告都公布了将网络高等教育纳入其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高校比例。2015年的斯隆报告将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如图1所示。



图1 将网络高等教育纳入其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高校比例
(单位：%)

图1显示：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将网络高等教育纳入其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高校比例分别为69.1%、65.9%和70.8%，2014年的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点，2014年比2012年上升1.7%，2014年比2013年上升4.9%，且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可见，2014年更多的高校看好网络高等教育的价值。这和汤姆·库尔曼（Tom Kuhlmann）的观点一致，即“网络高等教育能够降低学费、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二、网络学生注册人数年增长率下降且保留率下滑

历年的斯隆报告都关注网络学生注册人数的年增长率。由于该项统计比较困难，所以斯隆报告的统计结果往往滞后1~2年。截止2015年的斯隆报告，对此项的统计数据只到2013年，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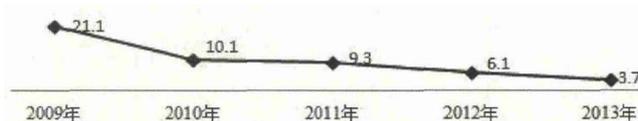


图2 网络学生注册人数的年增长率（单位：%）

由图2可知：2009—2013年，网络学生注册人数的年增长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2013年达到了历年最低点。斯隆报告认为，美国网络高等教育注册人数已经进入稳定期。其他调查也显示，2013年“美国网络高等教育的注册人数已经进入平稳增长期，而且在未来五年，美国的网络高等教育会进入高原期”。依据理查德·加勒特（Richard Garrett）的研究可知，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网络高等教育已经在美国普及，其未来发展需要找到“新的市场动力”。

2015年的斯隆报告还对网络学生保留率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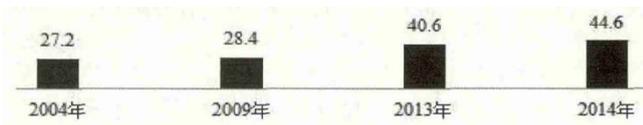


图3 “与面授高等教育相比，网络高等教育更难保留住学生”的调查（单位：%）

由图3可知：在2004年、2009年、2013年和2014年，认为与面授高等教育相比，网络高等教育更难保留住学生的高校比例分别是27.2%、28.4%、40.6%和44.6%。2014年比2004年上升了17.4%、比2009年上升了16.2%、比2013年上升了4.0%。可见，与面授高等教育相比，网络高等教育更难保留住学生。哥伦比亚大学的调查报告也显示：“注册网络高等教育的学习者的辍学率几乎是面授教育的一倍。”根据尼古拉·内斯特（Nicolae Nestor）等的观点，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是：（1）网络学生很容易因为工作或者家庭原因而放弃继续学习；（2）网络学生知识水平参差不齐，一旦跟不上课程进度就会选择退学；（3）一些学习自主性较差的学生容易中途退学。

三、MOOC的普及及其作用尚不明朗

2012年，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等一些著名大学陆续在Coursera、Udacity和Edx等课程平台发布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简称MOOC）。《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称2012年为“MOOC之年”。斯隆联盟捕捉到MOOC对于网络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对此开展了调查。

1. 大多数高校对MOOC持观望态度。2015年的斯隆报告将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加入MOOC的高校比例（单位：%）

	已经加入	准备加入	尚未决定	不加入	总计
2012年	2.6	9.4	55.4	32.7	100
2013年	5.0	9.3	52.7	33.0	100
2014年	8.0	5.6	39.9	46.5	100

表1表明：2012-2014年，已经加入MOOC的高校比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MOOC日益受到高校

的青睐。正如塔尼亚·罗斯卡拉（Tanya Roscorla）所说：“MOOC是一种引诱人们加入网络高等教育的罂粟。”综合高等教育研究中心（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和Coursera公司等机构的调查结果，加入MOOC的高校数量增多的主要原因如下：（1）MOOC是一些高校提升教学质量和学校声誉的重要措施；（2）MOOC能给高校带来经济利益，如一些大学可从课程收益中提取6%-15%的收入，有些课程利润甚至达到了20%；（3）美国联邦政府给予加入MOOC的高校很大的支持，如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为促进MOOC的开发，为加入MOOC的高校提供20万美金的资金支持。

2012年尚未决定加入和不加入MOOC的高校比例是88.1%，2013年的比例是85.7%，2014年的比例为86.4%。这表明多数高校对MOOC持观望态度。莱德·瑞瓦德（Ry Rivard）认为：“注册MOOC的学生的辍学率已达到90%，这越来越让各大高校对MOOC持怀疑态度。”理查德·加勒特等认为，高校对MOOC持怀疑态度的原因如下：（1）目前MOOC仍然只在少数高校开展，其运行机制并不成熟；（2）大多数高校由于师资力量和经费等限制无法加入MOOC，而且这些高校也不愿探索完善MOOC体系的方法；（3）高校无法提供完善的支持服务，如MOOC缺乏师生和生生的互动，容易造成学习者孤独焦虑、无集体归属感等心理，且高校无法为学习者提供相应的互动平台；（4）MOOC的运营模式尚未成熟。

2. MOOC的作用尚不明朗。表2表明：2012-2014年，认同MOOC对网络教学很重要的高校比例一直在下降。有些高校教师明确反对提供MOOC。如有些教师认为，MOOC不应游离于面对面教学之外，应该是面对面教学的补充；还有教师认为MOOC缺乏问责制，如对于学生的课程完成率，谁是主要责任承担者？是高校、教师还是MOOC平台提供者？

2012-2014年，同意MOOC可以解决网络课程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校比例也呈下降趋势，这说明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对MOOC的可持续性表示怀疑。吉米·贝克特（Jamie Beckett）就提出了

一系列问题：MOOC的课程结构是完整的吗？MOOC的教学内容能与时俱进吗？MOOC的教学评价能贴近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吗？

表2 对于以下观点持认同态度的高校比例（单位：%）

	MOOC对高校网络教学很重要	MOOC是网络课程可持续发展的方法	MOOC提供证书会导致高教学位制混乱
2012年	49.8	28.3	52
2013年	44	23.2	64
2014年	27.9	16.3	无

根据2014年的斯隆报告调查结果（2015年无此项调查），2013年同意MOOC会导致传统高校学位制混乱的高校比例比2012年上升了12%。综合尼克·基德瓦尼（Nick Gidwani）等的观点，通过完成MOOC取得学位可能导致高校学位制混乱的原因如下：（1）目前大多数学生完成MOOC后无法与面授教育中的学分和其他学位对接；（2）完成MOOC获得的证书大多数是由MOOC平台颁布的，目前尚无权威的MOOC证书认证机构。

四、需要更多的纪律约束

网络学习作为网络时代的学习方式，具有自身的优势。但要想取得面授学习的效果，是否需要制定更多的纪律？对此，斯隆报告开展了相应的调查。

图4显示：根据2014年的斯隆报告调查结果，与2005年数据相比较，在2013年认同加强网络学习纪律约束的高校中，除了副学士学位院校，其他高校的比例都上升，且一半以上的高校认同这一点。这说明，为了提高网络学习的质量，高校必须意识到纪律在网络学习中的重要意义。在2013年斯坦福大学网络高等教育论坛上，吉米·贝克特（Jamie Beckett）明确提出：“纪律问题是网络高等教育巨大的潜在问题。”综合哈佛大学网络学院（Harvard Extension School）等机构和学者的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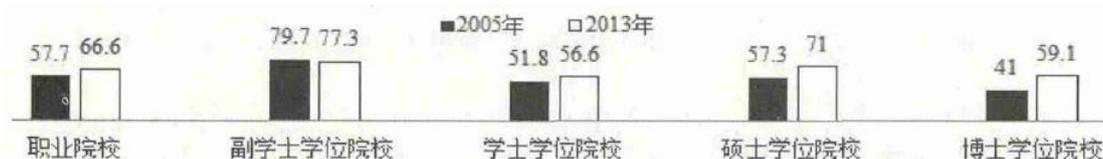


图4 “与面授学习相比，网络学习需要更多的纪律约束”的调查（单位：%）

点，网络高等教育要加强纪律有如下原因：（1）网络学习要求学生有很强的自制能力，所以制定更多的纪律是必要的；（2）与在校生成相比，网络学

生在心理上并不认同自己的身份，因此并不认同学习纪律；（3）很多

高校没有制定专门的网络学习纪律，如哈佛大学网络学院只列举了网络学生考试的不诚信行为，但没有相应的预防和处罚规定。

针对“网络高等教育是否需要制定更多纪律”这一问题，2015年的斯隆报告进行了相应的调查。

图5表明：关于“网络高等教育是否需要制定

更多纪律”这一问题，2005年、2013年和2014年分别有70.0%、70.7%和70.9%开设网络课程的高校表示支持，2014年比2005年上升了0.9%，2014年比2013年上升了0.2%；分别有40.5%、61.1%和59.0%未开设网络课程的高校表示支持，虽然2014年比2013年下降了2.1%，但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由数据可知，高校清楚地认识到纪律对于保障网络高等教育质量的必要性。罗纳德·哈里斯（Ronald Harris）等认为：“随着网络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扩大，目前发展网络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规范和加强纪律约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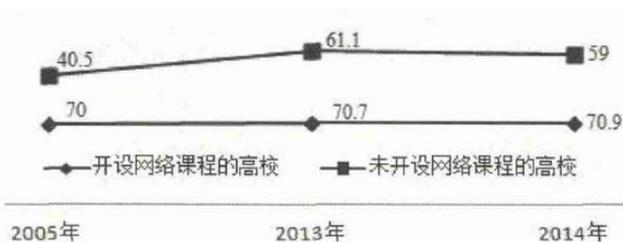


图5 网络高等教育是否需要制定更多纪律的调查

（单位：%）

更多纪律”这一问题，2005年、2013年和2014年分别有70.0%、70.7%和70.9%开设网络课程的高校表示支持，2014年比2005年上升了0.9%，2014年比2013年上升了0.2%；分别有40.5%、61.1%和59.0%未开设网络课程的高校表示支持，虽然2014年比2013年下降了2.1%，但整体处于上升趋势。由数据可知，高校清楚地认识到纪律对于保障网络高等教育质量的必要性。罗纳德·哈里斯（Ronald Harris）等认为：“随着网络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扩大，目前发展网络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规范和加强纪律约束。”

五、教学效果下滑

2015年的斯隆报告调查了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网络高等教育的教学效果，如图6所示。

图6显示：

2012年、2013年和2014年，认为网络高等教育比面授高等教育的教学

效果差的高校比例分别为23.1%、25.9%和25.9%，2014年和2013年的高校比例相同，都比2012年上升了2.9%。可见，与2012年数据相比较，更多高校并不看好网络高等教育的教学效果。坦雅·罗斯科拉（Tanya Roscorla）归纳了五个原因：（1）在网络高等教育中，教师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掌握和运用新技术，但是得不到相应的报酬，而且在职位晋升中也不考虑教师是否从事网络教学，这严重打击了教师从事网络教学的积极性；（2）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不适应网络教学；（3）大多数高校没有制定网络课程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4）高校没有为从事网络教学的教师提供足够和有效的培训支持；（5）网络课程内容更新慢，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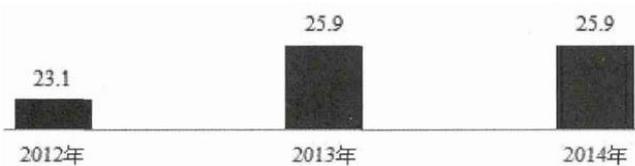


图6 网络高等教育比面授高等教育的教学效果差的高校比例（单位：%）

六、结论与展望

通过对2014年和2015年斯隆报告提供的数据进行比较，在不同维度，美国网络高等教育的等级改变是明显的，这表现为如下方面：（1）同意将网络高等教育纳入其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高校比例上升；（2）网络学生注册人数年增长率下降且保留率逐年下滑；（3）大多数高校对MOOC持观望态度，MOOC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进一步验证；（4）网络高等教育纪律约束不足；（5）网络高等

教育的教学效果下滑。

通过解读2013-2014年美国网络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特征，我们可以展望网络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1）将网络高等教育纳入高校战略规划的意义自不待言。这是因为网络高等教育有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能使更多的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2）提升网络学生保留率间不容发。高校将会更加关注网络学生的特征（如工学矛盾突出、学习水平参差不齐、学习自主性差等）和网络学习的特征（如自定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自主安排学习时间、自我规划学习进度等），以增强网络学生对网络高等教育的归属感和成就感。（3）发展MOOC锐不可当。

未来MOOC要解决如下瓶颈问题：（1）支持服务体系要到位。如MOOC与传统教育之间的学分能互认吗？（2）运营模式要科学。如政府、企业和高校之间如何分工合作才能确保MOOC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3）认证制度要完备。如MOOC的学分和学位获得标准和传统教育的标准有什么不同？（4）加强网络高等教育纪律事不宜迟。越来越多的机构将制定网络高等教育章程，规范网络高等教育发展。（5）提高网络教学效果刻不容缓。好的教学效果是网络教育的生存之道。

（熊华军，西北师范大学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甘肃兰州 730070；褚旭，西北师范大学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70）

（原文刊载于《现代教育技术》2015年第6期）

“2016：我的一点希望”专家笔谈会实录

随着2016钟声的响起，我国职业教育踏入了又一个新春。

回首2015年，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视察职业教育并做了重要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职教法执法检查并做了专题询问，国务院设立“全国职业教育活动周”……

我国广大职教工作者深入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锐意开拓进取，加强改革创新，职业教育发展进入了新的黄金期，又一次站在了历史新起点上。

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充满希望的一年。为反映众多专家学者对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的心声和期盼，《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社举行“2016：我的一点希望”专家笔谈会。

笔谈会所约请的专家，基本覆盖了职业教育的全部领域。集合起来看众多专家对2016年职业教育的期盼，是很有意义的。专家们所思所想的主旋律，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所提出的改革命题、改革方向和政策建议，是很有价值的。本刊原貌展现专家们的来稿，以飨读者。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

举起一杆旗子：为每个人提供最适合的教育

近些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越来越多地吸引了社会的目光，各级领导重视有加，行业企业日趋青睐，毕业生就业率保持高位、就业质量日渐提升。这一景象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我体会最基本的原因是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过程，无论在育人还是在育才方面，都大踏步地向着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方向迈进。这里所说的针对性，不仅指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更加吻合，更包括教育过程与学生的成长和个性更加匹配。换一句话说，就是职业教育战线在默默地进行着一项至关重要的探索：为

每个人提供最适合的教育。现在是我们举起这杆旗子的时候了，这是职业教育坚定前进方向的要求，也是社会各界对教育发展的更高期待。谁来做这杆旗子的旗手？各类职业教育的办学——校长，是当仁不让的旗手。

为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要求职业教育改革更加聚焦内涵。一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为改革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和更为科学的政策支持，行业企业更为主动地参与其中。比如，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工作中落实好放开专业方向这一政策，切实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等。二是职业学校要在全面建立教育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严谨、灵活、有效的教学运行机制。比如，树立“改变从今天开始”的信念，把提升管理水平行动切实落实到教育运行中，推动教学工作诊断和改进成为职业学校的常规工作等。三是实现各类教师与学生的更紧密互动，学校特色发展与学生个性成长的更有机结合，使学生在学校支持、老师指导下的冒尖冲动和自主实践成为新常态，使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教育与职业技能培养有效融合，教学活动与环境熏陶相互促进。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刘建

同：

使继续教育在“十三五”时期有一个良好开端

在挥别2015和迎接2016之际，寄望我们的继续教育教育工作能够取得新进展，学习型社会建设能够迈上新台阶。

2016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三五”时期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决胜阶段。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进展和成果对夺取决胜阶段的新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总结“十二五”和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五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成就辉煌，已进入

世界中上发展水平。但客观地看，我们还有一些薄弱环节，继续教育位列其中。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到2020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没有继续教育的充分发展这一目标将是难以实现的。

为此，我们必须从构建较为完备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基本建成学习型社会的高度，推进继续教育在“十三五”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就2016年来说，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出台推动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改革发展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推动开放大学建设和电大系统转型发展，探索自学考试制度改革，切实加强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发展老年教育，创新行业企业职工继续教育，努力使全民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人心并外化为具体行动，为形成学习型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和制度支持。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刘占山：

尽快落实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要求，“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但时至今日，这四项办学自主权一项都未落实。2016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之年。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的供给方，急需激发办学活力，以社会需求为导向，面向市场依法自主办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促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但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学校还没有设置和调整专业的自主权，无法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带来的新技术、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等职场的新变化以及社会对职业培训的新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学校还没有面向社会招聘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以及教师职务评聘的自主权，致使教师队伍很难适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加之，学校更没有激发教职员工活力的分配权和激励机制，致使多数职业院校的办学效益和社会贡献度很难大幅度提高。期待2016有关政府部门能真正地转变职

能，撤销一批束缚学校自主办学的不合理规定，给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推动职业院校面向社会实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自主办学，激发职业院校的办学活力。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杨进：

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随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推进，经济社会越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越高，就越需要高质量、灵活多样、特色鲜明的职业教育。肩负培养数以亿计的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职业教育的发展应当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首先希望各级政府要科学把握人民群众的受教育需求，要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结构出发，统筹规划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在“十三五”规划中切实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特别要在实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目标中，避免出现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就是普及普通高中教育的情况，要坚持高中阶段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总体要求。

二是希望职业教育战线忠实秉承“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历史使命，坚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方向，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和校企合作的治理结构，认真分析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提高培养和训练的针对性、适应性，以增强学习者就业创业能力为核心，加强思想道德、人文素养教育和技术技能培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升职业院校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三是希望行业企业和各有关方面切实落实中央提出的“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的要求，关键就是要提高技术工人初次分配收入，让技术工人的尊严、社会的公平正义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工资收入上，让他们实实在在地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尽快改变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技术工

人工工资总体水平偏低状况，促进全社会形成对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正确认识，使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蔚然成风。

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昭文：

成人继续教育要扩大规模，重点培训，提升质量，保障有力

2016年是实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战略目标进入攻坚阶段的重要年份，是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三五”规划和“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作为成人继续教育工作者，我对成人继续教育的一点希望是：扩大规模，重点培训，提升质量，保障有力。

扩大规模。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和职教教司的初步统计，2015年各类成人继续教育的培训规模约2亿人次，与9.2亿劳动年龄人口和2.1亿老年人的教育对象相比，与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从业人员年培训参与率达到50%、年培训规模达到3.5亿人次的要求相比，成人继续教育的规模亟须扩大，参与率亟须提升。我希望积极发展成人继续教育能够列入教育部门的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列入对教育重点工作的评估考核范围。

重点培训。我建议成人继续教育要抓好四个重点群体的教育培训。一是抓好3.9亿城镇就业人口的教育培训，这对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作用。二是抓好3.8亿农村就业人口中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这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具有重要作用。三是抓好2.7亿农民工群体的教育培训，这对促进“四化同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四是抓好面向2.1亿多老年群体的教育培训服务，这对于充分发挥老年人作用，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提升质量。要以学习者为中心，把提升教育培训质量作为成人继续教育的核心任务。要调查摸清各类成人的不同需求，按需施教；要加强课程教材和教学资源建设，加强教育教学管理，采用“互联

网+”的方式，着力提升成人继续教育的质量和效益。

保障有力。积极发展成人继续教育，建设全民教育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必须解决好成人继续教育的扶持政策、形成部门分工合作的合力，教育等部门要联合出台扶持政策，解决好教师、设备、经费投入等核心问题。

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推进成人继续教育加快发展，不断提升质量和效益，为实现全民教育终身学习、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周稽裘：

期盼职业教育加快转型走向新常态

跨越第一个百年，走向第二个百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进程，同属实现“中国梦”的全局。职业教育这五年来的发展，已经孕育了未来全面转型的历史必然。2016年我们面临职业教育后普及时代转型发展的变革。

首先是形态性转型，职业教育走向新常态。即从传统的精英教育转向全民大众型教育，从传统的一次性学历教育转向终身教育。习总书记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批示中指出，要“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这就为我国职业教育的现代转型指出了方向：以人为本，面向人人，面向人生。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高等学校要适度提高招收职业学校毕业生的比例，逐步扩大招收有实践经历人员的比例。这就是与时俱进的制度性安排。

其次是过程性转型，职业教育开启新模式。不仅在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模式方面逐步从传统封闭形式转型为现代开放模式，而且着重于解决长期以来教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实际的老问题，引导学校发展的行为方式从自我膨胀式转型为社会协同服务型方式。促进职业教育在开放式育人、技术技能的积累创新和学生大众创业、精准有效的社会服务以及民族、区域文化的传承等方面拓展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有为才能有位”，

这为职业教育落实战略地位，提升社会影响力不断积累正能量。

职业教育现代化实际上是现代性的获得和发展并为国家现代化服务的过程，而转型性创新性就是现代性的最重要标志。跨越第一个百年、面向第二个百年的全面转型，就应该全面落实《规划纲要》确立的“体系开放、机制灵活、渠道互通、选择多样”的人才培养体制，坚持全面发展，尊重个体差异，提供多样化学习机会，安排好可选择性的管理制度，最终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造就人人出彩的社会奠定理论、道路、制度的基础，这就是职业教育现代转型要实现的“中国梦”。

中华职业教育社副总干事杨农：

重视面向地市级行政区域的 职业教育研究和指导

2016年，我希望职教界更加重视面向地市级行政区域的职业教育研究和指导，推动国家制度在中观层面的转化和落实。

应该重视以地市为单元的跨界对话和多部门联动机制的建立。推动地方政府协同职业院校每年召开一次跨界跨部门对话会，参加部门和单位应包括发改、教育、财政、工信、农业、人社、行业协会、重点企业，政府主要领导向院校介绍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各有关方面提用人需求，职业院校提出对接措施和请求支持的事项，坚持下去，成为传统，必有大益。2015年中华职教社推动四川省德阳市首次举办跨界对话会，取得成功，2016年将复制这种模式到其他地市。

再就是鼓励和推动地市级政府设立职业教育发展专项基金，已知河南省驻马店市设立了这种基金。我认为，用基金可以签约外聘学校急需的双师型教师，使外部智力资源为己所用；可以礼聘客座教授提升学校的学术水平，提升学生通识教育水平；可以帮助本地教师外出参加高端培训，提升与转型相适应的业务能力。政府投入种子基金，面向全社会募集，建立规范的基金管理体制，保持蓄水又常流常蓄的基金运作模式是动员社会参与职业教育的一种好形式。

第三，鼓励和推动地市级政府的专业层面购买职业院校服务。通过调整政府投入方式调整职业院校发展方向，培养职业院校精准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能力，出精品专业，出优秀教师。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嘉毅：

让孩子能够主动选择职业 教育

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后，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因社会传统观念、用人制度以及职业教育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对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认可度还不高，学生不是主动选择职业教育，而是“无奈地”“被选择”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因此，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让孩子主动选择职业教育，便是2016年我的一点希望。

为实现这个愿望，我认为最核心的就是提高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健全就业准入与用人制度。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和人的全面发展，加强学生素质教育；坚持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专业布局，较好地满足和社会需求；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大力推广现代学徒制和集团化办学；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兼顾中高等职业教育贯通培养，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坚持培养、培训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为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提供有力的基础保障；坚持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使用国际上成熟的教育教学模式、专业教学标准和职业资格标准。

健全就业准入与用人制度，主要是从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一方面要引导破除鄙薄职业教育的偏见，修改不适当的、唯学历要求的相关政策文件，清理对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晋升等方面的不合理规定，营造平等的就业就学和职业成长环境；另一方面要切实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一线技术劳动者的待遇，同时落实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就业制度，提高一线技术岗位的就业门槛，凸显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优势。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

加快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

“十二五”期间，江苏职业教育统筹规模、结构、质量、效益，改革创新，基本建成遵循职业教育规律、适应现代产业需求、中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江苏将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工程，加快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我们将致力于规模结构更加合理，教育公平得到实现，职业院校与普通院校毕业生拥有同等升学机会；质量水平全面提升，启动建设现代化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现代化特色学校、现代化实训基地、现代化中职专业群和职业学校智慧校园；健全中高等职业教育相衔接的课程体系，整体提高“双师型”教师队伍素质，进一步增强服务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我们希望，职业教育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一是职业教育政策法规逐步完善，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尽快出台，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健全提供保障。二是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立交桥”更加通畅，实行职业教育分类招生考试制度，逐步扩大本科高等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规模和比例，不断完善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紧密衔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职业教育管理体制进一步理顺，国家建立统一的中等职业教育（含技工学校）办学标准、专业建设标准、实训基地建设标准、学籍管理平台和质量评价标准。四是政府统筹、部门协调体制与投入机制更加完善，市场作用充分发挥，公办、民办职业教育协调发展。我们期待，全社会人才观和就业观明显改善，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的氛围更加浓厚。

重庆市委教育工委书记赵为粮：

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能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职业教育如何把握新常

态、适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必须厘清思路，从专业建设、人才规格、依法治教等三个维度，加快推进改革和发展，提升职教服务能力。

一是围绕产业升级转型，加强职教专业建设。瞄准“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围绕“三大支撑带”战略实施，针对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新需求，及时设置一批新专业，升级一批原专业、淘汰一批旧专业，建设适度超前产业经济发展或与产业发展同步的职教专业群。专业优，则能力强。

二是围绕创新驱动战略，提升人才培养规格。职业教育在稳定规模的基础上，要把资源配置和工作中心转移到提高质量和内涵建设上来，适度提高规格、层次；要推动一大批普通本科院校加快办学目标定位和人才培养规格的转型，同时，鼓励高水平大学培养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

三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依法推动职教发展。深化办学体制机制改革，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加快修订职教法，依法落实行业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教的责任，完善多元办学、公办民办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海南省教育厅副厅长潘惠丽：

以质量为核心构建海南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16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开端，中国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的发展理念的引领下，迈进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阶段的开局之年，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社会发展面临新挑战。站在重要的历史起点，职业教育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实现新突破，是每一位职教人需要直面和解决的新课题。

海南职业教育经过8年的持续发力，政策倾斜、改革创新、奋发实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十三五”时期，我们将以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目标，以提高人才质量为核心，稳定规模、夯实基础、调整结构，改革创新，全面发展。

2016开局之年，我们期望职业教育增强吸引力，让职业院校师生有更多收获感和尊严。师生的获得感和尊严，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内生动力，只有以人为本，不断满足师生的发展需求，才能激发职业教育的活力。要继续加大政府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毫不动摇地贯彻落实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定位；国家制定出台更加切实的校企合作支持、保障政策，加快研制分类考试政策，统筹谋划实施分类考试、招生录取工作，畅通职业院校学生升学通道；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面向市场需求，以就业为导向，立德树人，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使学生学有所获、学有所用、学有所值。

2016开局之年，我们还期望职业教育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助力器，助推区域经济发展。今年，我们工作的重点是立足海南三大优势和12个重点产业，主动适应海南产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的实际需要，着力研究和调整专业结构，建设一批适应需求、特色鲜明的重点专业群；建立“政企行校”四位一体合作机制，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变，为海南绿色崛起、全面建设国际旅游岛提供人才保障。

去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登万步高。我们将继续奋力前行，这是职教人的时代担当和使命担当。

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战高峰：

重视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职业素养

“十三五”开局之年的“2016年”，提高职业院校管理水平，实现“改变从今天开始”，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中国制造2025和供给侧经济结构改革培养高素质劳动者与技术技能人才，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职业教育作为培养生产一线熟练操作人员和技术工人、高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学生在校期间实习实训的规范操作教育、安全生产教育、劳动保护教育非常重要。这是学生能否尽快适应企业实际工作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制造提升质量的关键所在。人们经常感叹同一个设计、同样的材料、同样的生产线等完全相同的条件，国内生产的产品质量不如国外，原因可能很复杂，但操作人员

基本素质、职业素养的差距不能不被重视。笔者由于工作原因考察了一些职业院校，深深地感到学生在校期间实习实训的规范安全操作与企业要求还有差距，学校、教师、学生对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的重视程度还有待于提高。为此提出如下希望和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强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把兼具生产和教学功能的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纳入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二是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监管，对实操性强、与现代制造业紧密相关的专业设置，把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作为重要指标实行一票否决。三是进一步加强校内实习实训教学环节的投入和管理，职业院校要有专项经费保障实训安全，在管理上要抓小、抓细、抓实，落小、落细、落实。

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副校长谢维和：

职业教育要有教育性

近年来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一直纠缠在职业性与普遍性的矛盾之中，政府、学者与实际工作者等几乎都不惜余力地试图改变职业教育普通化的现象，不断加强职业教育的职业化。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除了这个职业化与普通化的矛盾之外，还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矛盾，即职业教育中技能性与教育性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个矛盾恐怕是影响和制约目前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更加主要和关键的矛盾，而教育性甚至可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如果说现在职业教育学校的招生分数不高，其中的原委可能并不是他们的学习成绩不高；如果说目前职业教育学校的毕业生就业不算太好，其中的原因也许并非是他们的技能不高。我认为，这里的短板仍然是基本素质的培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在学习和发展中的自我调控能力，或者说，自律的能力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和水平。没有真正切实地认识他们自己，用学术语言讲，则是没有形成适当的自我认同。从许多的案例来看，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与其倾其全力强调技能培养，不如更加关注职业教育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特别是自我调控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培

养与发展，更加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认识和管理他们自己。这样的职业教育，才是企业和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

“教育供给侧”需要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多次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三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话题。这些新提法给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以新启示。作为与经济发展结合最为紧密，承担着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的职业教育，也就是承担人力资源供给任务的职业教育，是时候要考虑如何进行“教育供给侧”改革了！

人力资本的素质决定了中国制造的质量。职业教育要主动为国家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出自己的贡献，需要强化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目的的教育，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双创教育”是通识教育的升级版，是新经济时代的通识教育。要以此为契机，通过“双创”教育，提高人才“供给”质量，进而提高职业教育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效果和效率，实现职业教育以致整个教育的“精准供给”。这个“精准供给”，既是“精准”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是精准地满足个体个性化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的人才供给！

基于此，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只有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跨界思考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宏观层面，至少应包括：给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待遇，以扩展教育机构的内涵与外沿；构建国家资格框架，以实现育人的职业教育制度与用人的劳动就业制度的整合与融通；建立国家级职业教育管理机构，以确保在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对职业教育的政策、投入、资源、监控等诸方面的统整与协调！而在微观层面，要从以存储知识为主转向应用知识为主的课程与教学。

期待着新一年，职业教育能在“教育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领域，做出独特的贡献！

上海市教科院研究员马树超：

职业教育真正从注重规模发展转向注重内涵发展

2016我的一点希望是，职业教育真正能够从注重规模发展转向注重内涵发展，注重教学质量全面提高。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说简单是因为大家都清楚，由于最近10年职业院校教学资源跟不上在校生规模增长需要，生均办学资源大量稀释，生师比尤其是高水平教师与学生比、生均教学设施尤其是实践教学工位等跟不上学生数发展需要，还有学生宿舍等生活场所、设施跟不上，有的院校将三年级学生企业顶岗实习模式作为解决学校办学资源短缺的基本路径，教学质量标准的执行成为很大问题。说复杂是因为在校生规模发展的惯性很大，有的地方把学校规模发展当政绩，很像地方发展的GDP情节；再加上目前不少地方正在推行的生均拨款制度，在校生规模成为学校教育经费增长的重要筹码，事关学校办学的资源配置，等等。我以为，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中阶段的普及都已进入较高发展水平的新阶段，面对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新时期，面对国家提出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期待2016年能够形成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良好政策环境。职业院校不必纠结于生源和顶岗实习问题，学生能够得到更多的个人化关注，职业教育适应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企业需求的能力将会不断增强，职业院校的发展前景将会更加美好，学生的发展将会更加健康。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石伟平：

加强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

2015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强化高端制造业的国家战略规划《中国制造2025》，这是建设中国为制造强国的三个十年战略中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2025》明确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变革，形

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在未来，中国制造业将以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为主线，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健康稳定发展。

很显然，“中国制造2025”将对人才提出全新的要求。“新技术”“新产业”也必将催生职业教育发展的“新专业”“新规格”与“新模式”。为服务“中国制造2025”的国家战略，展望2016，职业教育亟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实现同步转型。

首先，需及时调整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与结构。新技术的推广和新产业的发展会使一批传统工作岗位消失，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将面临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职业院校需紧跟绿色制造、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开辟新的专业或方向，并对专业重点做出相应调整。其次，需重新确定职业教育的专业人才规格。在未来的制造业企业中，简单重复劳动将主要由机器来完成，被机器替换下的人应该向高端服务岗位转移。因此，职业教育的专业人才规格需要从“硬技能”的培养转变为“软技能”的培养，从文字素养的培养转变为数字素养、信息素养、设计思维、创新思维、艺术素养等的培养，这势必也将要求职业教育的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做出相应转变。再次，需改革创新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互联网+”和3D打印技术等新兴产业形态给非标准化、个性化的需求和生产拓展了空间，也给创新创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越来越多的人由传统的“被动就业、自我雇佣（被动创业）”转变为“主动创业”。因此，职业教育需要顺应这一就业形态的转变，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如在人才培养中注重创业教育、注重普及生产、服务和日常生活中的技术教育，突显劳技教育的重要性等。

中国冶金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夏昌祥：

深化改革，实现更加公平的职业教育

既然职业教育的春天再次到来，期冀在深化改革和充满希望的2016年里能见到更加公平的职业教育景象：

第一，希望企业举办的职业院校应同样享受事

业单位待遇，落实生均拨款，不然，会有一批办得不错的职业院校，将因企业经营不行而难办下去。

第二，希望民办职业院校也同样享受事业单位待遇，在恢复与公办职业院校收取同样学费的情况下，不但能落实生均拨款，更能落实教师编制，不然会因长期留不住教授而使办学更加困难。

第三，希望我国《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能像德国一样，把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学会协调按规定接受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和按规定时间及要求开展员工职业培训并由行业协会学会予以监督写入法律，就会让我国职业教育真上大台阶。

第四，既然已完成了职业院校的“211”和“985”建设，就望在国务院发布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规划的同时，同步规划实施创建世界一流职业院校（应用型大学、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流专业的发展规划。这样很可能使中国职业教育向全球知名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靠拢，并很可能使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真正走在世界前列。

大庆油田钻井二公司经理裴昱：

加强职业学校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

企业领导相聚，谈及员工的素质，最多的无奈、感叹和困惑是：现在的员工执行力不够，执行力总是打折，结论是员工缺乏基本而必要的职业精神。执行不力的客观表现是：不精，即工作粗放，方法简单，“低、老、坏”问题多；不高，即标准不高，但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不严，即自我要求不严，轻视制度，敷衍执行；不实，即重表面，轻过程，重应付，不落实等。

执行不力的主观表现是：敬业态度、进取精神、责任信念、服从意识、标准做事习惯、雷厉风行作风、胜任工作能力等的缺欠或缺失。

影响员工职业精神塑造的因素很多：起始教育、个人信念、领导方式、企业氛围、社会影响等。我认为员工职业精神有三条非常重要，不可或缺：职业自觉，职业意识，职业自豪感。

第一，启发职业自觉。良知，许多时候比说教

更可靠。开发员工本身天性里自有的良知，是首要的措施。良知这种理性的自觉来自于心灵深处对“至善”的把握和对“错误”的摒弃。我们的教育要更多地挖掘人性的阳光一面，让良知成为主导，让良知引领行为，少一些枯燥的说教，少一些麻木的空谈，这样才能推进知行合一。

第二，培育职业意识。职业意识是员工“态度、价值观、信念、责任感”等的综合反映，是作为职业人所具有的主人翁精神，是工作积极认真，有责任感，有基本职业道德的表现。人的价值观的形成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需要一生的修炼，但外因的影响却十分重大，榜样的力量也是无穷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就是培育员工职业意识最好的素材，“三老四严”“四个一样”就非常质朴而纯真地道出了一个石油人的职业道德。

第三，提升职业自豪感。“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当年的石油工人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但却唱出了如此自豪的心声。而如今如何提升技能操作员工的岗位自豪感和爱岗敬业的情操，是个十分普遍的难题。需要我们在全社会营造“劳动光荣，崇尚技能”的氛围，更需要我们的职业教育专家从源头上播下兴趣的种子和责任的基因，使他们进入职场后在岗位上成功成才。你撒下的是种子它就生长庄稼，你播下的是放任它就生长野草。因此，构建员工职业精神，需要良种和园丁，也需要环境和过程。

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董刚：

切实增进校企合作的力度与深度

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也是高职院校体现以就业为导向、服务区域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由于在目标、管理和任务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校企双方合作的深度、广度和持续性，致使校企合作仅仅停留在中、浅层面。

一元复始万象新，锐意改革著新篇。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充满期待：

一是期待职教法进一步规范，从国家到地方

各级层面系统化制定相应的《校企合作促进法》，强化政策支持和监管保障，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为企业在税收、员工待遇及落户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优惠，扎实营造“人才共育、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良好局面。

二是期待高职院校能够更新理念，在新常态下本着“教育与产业融合、学校与企业共建”的思路创新合作机制与模式，主动顺应企业的管理流程和转型升级的要求，积极邀约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的全过程，努力拓展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形式和内容。

三是期待企业能够抓住“创新驱动”的战略机遇，借助校企合作的平台，创造机会让学生掌握最新的技术技能，提供条件孕育活跃开放的学习环境，通过各种人才计划、创新竞赛等发掘和培养创新人才，为企业自身的发展积蓄力量，储备人才。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联席会议主席邬宪伟：

建设现代职业院校是2016年的重要任务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渐趋丰满、制度不断健全、道路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框架已见雏形。“十三五”期间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其关键是每个“细胞”——职业院校要成为现代职业院校。

现代职业院校的基本特征应该是特色鲜明、服务精准、应用宽泛的教育机构。职业院校的产品是课程，现代职业院校课程的现代性体现在特、精和宽三个方面：

首先是立德树人的特色。职业院校除了办学的专业特色外，更重要的是将教育的根本任务融合于职业教育中，在职业精神培养中立德树人，在职业素养培训中立德树人，在职业能力形成中立德树人。

其次是服务发展的精准。职业院校的宗旨是服务发展，一要服务社会发展，即精准感知社会的需求、精准设计课程方案、精准评价实施效果；二要

服务学生发展，即精准解析学生的个性、精准设计成长路径、精准实施培养过程。

三是促进就业的宽泛。职业院校的办学导向是促进就业，以人生的维度看，需要有的放矢的培养、需要工学交替的培养；以社会的维度看，需要学历与证书兼顾、全日制与短训并存；以对象的维度看，需要满足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人群。

专业和德育的特色、两项服务的精准以及院校为服务对象创造的宽泛应用，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会长周建松：

适应新常态，自觉强内涵

继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做出重要指示和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之后，2015年教育部和财政部等部门密集就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院校管理、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高高职院校生均拨款等下发了系列文件。应该说，“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内的职业教育工作重点、工作方针已经基本明确，缺的不是政策，而是行动；缺的不是理念，而是实践；缺的不是宏观，而是微观。如何适应新常态、抓内涵、重改革、提质量应成为我们自觉的行动。

作为一个实践工作者，我提出以下几点与同行共勉。第一，一定要有适应新常态的理念，抛弃规模扩张、摊设铺子、办学升格等传统思维方式，把工作注意力、工作重心自觉放到加强内涵建设上来。第二，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根本任务的办学宗旨，坚持以生为本，坚持教学为中心，坚持教师为主体，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创新创业教育，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第三，主动关注和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提升学校服务产业、服务行业、服务区域、服务社会的能力，提高学校的综合贡献度。第四，重视和加强院校治理能力和学校管理水平建设，努力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绩效，努力把纳税人的钱用得最佳，努力使学生的学习生活更加增值，既具较强就业上岗适应能力，也具可持续发展和成才成长基础。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孙爱武：

期待优质专科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尽快落地

教育部近期发布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为高等职业教育面向“十三五”持续深入推进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行动计划》适应国家财税体制改革总体部署，明确教育部负责国家层面政策制度制定，省级政府是各项任务和项目的实施主体。《行动计划》提出的2018年前建设200所左右优质高职院校的实施项目受到高职教育战线的普遍关注。

2016年，期待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政策尽快落地：一是希望教育部能够兼顾区域高职院校数量和整体发展水平，统筹确定各地优质高职院校建设数量，对高职数量多、发展水平高的省份予以倾斜；二是希望各地能够尽快出台优质高职建设标准和实施方案，引导高职院校明确改革发展方向；三是希望各项配套支持政策加快出台，落实好建设资金，切实保障优质高职院校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程时兴：

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培养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创新是创业者的生路，创新是守业者的活路，创新是从业者的生活之路。创新是什么？创新的种子在哪里？

创新就是通过更新、改变，创造出新的东西。创新的本质是突破，也就是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突破守旧的常规戒律。发明是创新，创造是创新，改革是创新，标新立异也是创新。创新四要素是好奇、执着、坚持和极致，创新靠的是好奇心，靠的是用执着和坚持去把握极致。只有想得到，才可能做得到，创新首先表现为好奇的发散思维活动，然后再按照一定的路径付诸实践并得到预想结果的过程。

一则故事引起人们深思，有一个幼儿园的阿姨问小朋友：“雪融化的结果是什么？”小朋友说：“雪融了，春天来了！”而阿姨却说：“不对，雪

融化就变成了水！”小朋友天真烂漫的想法被禁锢，从小就不敢有无拘无束的想象。

创新的种子来自于好奇，来自于天真的想象，来自于发散的思维。创新，从孩提时候开始就应该加以引导和培养，我们的教育活动一定要保护好与生俱来的好奇，培养好视野广阔的发散思维！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玉鸿：

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实现高职教育的新跨越

职业教育旺盛的生命力在于根植并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充分促进就业。如何服务国家战略是摆在高职院校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新疆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区，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先手棋。南疆是新疆工作的“棋眼”。大力发展南疆职业教育，对于促进南疆就业，实现260万人口全面脱贫致富意义重大。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把解决当前新疆面临的重大问题作为历史责任，把办好少数民族职业教育作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战略担当，把“托起农牧民孩子的美好明天”作为价值追求，把“培养爱国爱疆、敢于担当的优秀大学生”作为历史使命，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整体托管了喀什、和田地区“三县四校”，创新了整体托管南疆县级中职学校的新模式。一年来，托管学校焕发生机，学生稳定率高达98%，改变了“有校无生”的现状。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探索和实践这种托管帮扶南疆职业教育的新模式，争取在“十三五”期间整体构建“中高本衔接、南北疆协同”的具有新疆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希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一对一”“多对一”帮扶托管这种“校校联合”办学模式的改革创新，给予政策性的倾斜和支持，实现高职教育的新跨越。

北京市商业学校党委书记史晓鹤：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与祖国和时代同向同行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呼唤能够担当支撑国家发展战略历史使命和责任、能够担当服务人民幸福美好生活需要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教育！职教是篇大文章，职教是广阔天地，职教可以大有作为！职教人必须而且能够创作出最新、最美的图画！

在新的一年里，最重要的是要把五中全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与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结合起来，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精心做好学校“十三五”发展规划，坚持立德树人，在“供给侧”改革上下功夫，在研究国家战略新要求和大政方针上下功夫，在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新需求上下功夫，在职教定位上下功夫，在提供精准服务上下功夫，在“五个对接”上下功夫，在现代学校治理能力和水平提高上下功夫，在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在师生认可、社会满意上下功夫，在服务能力和贡献质量上下功夫！

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每一个学校都有清晰的战略、务实的措施、崭新的风貌！让我们每一名师生都有美好的梦想、坚定的信心、明确的目标！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因职教人的努力和贡献呈现人力资源强国的新风采！

浙江省宁波经贸学校校长钱文君：

生涯唤醒，从职普深度融通开始

一直以来，我国中考存在“一考定终身、一卷定未来、一报定方向”的尴尬局面，学生无法真正选择自己的教育类型和成才之路，存在“被动挤压”的成长状况，即在迷茫被动中选择专业，因学业成绩“排挤”到职业学校，在职业教育是“第二选择”的精神心理压力下成长。而且职业学校承担着“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为国家培养数以亿计的劳动者”的社会功能，将学生作为待“加工”的产品，按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加工”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常常被放在次要位置。

对接现代社会“多规格、多类型”的人才成长需求，职业学校办学应该从满足经济建设需求的一元价

值目标，向同时满足“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二元价值目标转变，树立“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立足学生本位生涯发展，探索实施职普深度融通教育，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生涯发展选择，学生能自主选择教育类型，能自主选择专业，能自主选择生涯发展方向。

职普深度融通教育，让学生“先体验，再选择”，帮助学生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专业，根据主观条件规划设计合理可行的职业生涯发展方向，发挥自身优势，取得生涯发展成功。这样，人的整体和谐发展与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目标“二元共存”，同时实现。

我们开展职普融通试点已有三年，期待2016年是职普深度融通的元年。

山西省忻州市原平农业学校校长贺雄：

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和关注农民教育

作为一名农业战线的“老兵”，新的一年，我最大的愿望是：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加重视和关注农民教育。希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通过更加有效的农业职业教育，使得农民兄弟的生活更加美好，广大农村变得更加美丽，农业产业化发展更加充满活力，全面小康充满希望。一是出台更加给力的政策，让广大农民得到补课和提升的机会。二是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应当更加科学、规范、有序，让这部分农民实现“大学梦”和终身教育。三是采取更加务实的举措，吸引新生代农民接受更加良好的教育，让他们在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全面小康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应当一如既往为农民教育、为农业职业教育奔走呼号，做出更大贡献。

陕西省乾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校长何战会： 完善校企协同育人的培养体系和长效机制

2016年是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又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冲刺攻坚阶段。职业教育注定将迎来不平凡的一年。抚今追昔，中国经济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到了实现战略转型的关键时期，急需一支高素质的新型产业大军。这给我们职教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实践证明，职业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校企合作。以我校为例，作为一个西部县级职教中心，所能得到的政府资助有限。学校曾因资金、设备、师资等困难而发展滞后。然而自从实施“引企入校，校企合作”后，我们不但走出了困境，还实现了跨越发展。2015年陕西省职业教育工作推进会还把我校“投资合作”“订单培养”等校企合作模式确定为展示亮点。

放眼2016年，我希望政府方面能出台相关优惠政策，调动企业合作育人的积极性；希望企业方面能立高望远，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希望学校方面能深化内部改革，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新模式。具体到我们学校则希望依托咸阳职教联盟、乾县职教集团的力量，发挥政府、行业企业、职业学校的整合优势，以现代学徒制试点为契机，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建立校企协同育人、共同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和长效机制，加强校企合作在内涵上的有机结合，推进校企合作全面深入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文刊载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6年第1期）